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9.06.002

官场小说叙事模式的新尝试 ——评马笑泉《迷城》

武斌斌

(太原师范学院 文学院, 山西 晋中 030619)

摘要: 接续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官场小说热, 马笑泉近作《迷城》也以反映官场生活为主要内容, 与此前官场小说叙事逐渐固化的“成长叙事”“官场探微”“腐败揭秘”等叙事模式相比, 《迷城》之叙事有较新的突破, 其主要表现在马笑泉将官场叙事的情节置于传统文化的根柢之上, 将文学创作与文化影响相结合。《迷城》之叙事, 不仅让小说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小说叙事的根底更为雄厚, 而且还改变了已有官场小说叙事模式的单一化局面, 兼容了更为广阔的思想与人生之“思”, 实现了“官场”与“人生”真正意义上的链接, 为后续官场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书写范式。

关键词: 《迷城》; 官场小说; 叙事模式; 传统文化; 文化影响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9)06-0008-06

引用格式: 武斌斌. 官场小说叙事模式的新尝试: 评马笑泉《迷城》[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4(6): 8-13.

New Attempt on the Narrative Mode of Officialdom Novels: Comment on Ma Xiaoquan's *The Lost City*

WU Binb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 Jinzhong Shanxi 030619, China)

Abstract: Following the popularity of officialdom novels in the 1980s and 1990s, Ma Xiaoquan's recent work *The Lost City* also takes the officialdom life as the main content. Compared with the narrative modes of "growth narrative", "officialdom exploration" and "corruption revelation" which have gradually solidified in the narration of officialdom novels before, the narration of *The Lost City* has made a relatively new breakthrough,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Ma Xiaoquan's placing the plot of officialdom narration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ombining literary creation with cultural influence. The narration of *The Lost City* not only makes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more plentiful and the narrative basis of the novel more solid, but also changes the single situation of the narrative mode of the existing officialdom novels, which is compatible with broader thoughts and the "thoughts" of life, realizes the real link between "officialdom" and "life", and provides a new writing paradigm for the subsequent creation of officialdom novels.

Keywords: *The Lost City*; officialdom novel; narrative mode; traditional culture; cultural influence

收稿日期: 2019-10-05

作者简介: 武斌斌(1989—), 男, 山西吕梁人, 太原师范学院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官场小说”脱胎于清末黑幕小说、谴责小说，经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小说、反腐小说以及影视剧作的改编热潮推动，遂成为了一种接受面极广、极受大众欢迎的小说类型。纵其如此，官场小说自产生以来就饱受评论界的非议，有关前者，鲁迅曾痛斥道：其小说“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1]。关于后者，亦有诸多评论家表示了严重不满，如武新军认为，官场小说一直存在着权力决定论的思维迷失、伦理判断的缺席、人文资源的匮乏、视野狭窄以及艺术手法的技术化与单一化等弊端^[2]，张存凯也认为官场小说一直存在着“权力批判与欣赏把玩的悖论”^[3]。如是，如何克服这些弊端，寻求官场小说描写的新突破就成为了此类小说亟需解决的大问题。就此而言，“文学湘军五少将”之一的马笑泉的近作《迷城》可以说是提供了一种新的写作范式。

—

有关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文化早熟的民族，在文学自觉产生之前，各种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文化体系已经达到了高度的成熟，这就让人难免产生一种中国有文化而无文学，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学只是文化的“载道”之体的认识。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们将旧文化与旧文学相绑定，一股脑儿地将《水浒传》《西游记》等文学作品也列入了“非人的文学”之列，这当然有一定的时代合理性，但就文学作品本身而言，此中难免有“祸及池鱼”之嫌。为求新文学的建立，“五四”新文学的作家们一方面极力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载道观”，另一方面努力学习西方的文学创作，力求创作出一批“为艺术而艺术”的“美文”作为新文学的新范式。但事实证明，文学与政治（道）的关系远没有新文学家所设想的那样简单，驱除了“旧道”，“新道”随之而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传入，“为艺术而艺术”的呼声逐渐被“革命文学”的口号所取代，但力求文学作为政治传声筒的左翼文学难免出现幼稚、机械、模式化的弊端。鲁迅说：“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然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4]至

此，“美丽可爱而无用的贵妇”的手艺变成了“绝艺”^[5]。1942年之后，随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文艺界创作界的金科玉律，文学与政治逐渐紧密绑定，并逐渐降级为了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各个领域对“文革”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模式的批判，文学创作领域对纯文学创作的呼声也愈来愈强烈。先前亲如一家的文学与政治，一夜之间似乎成为了“寇仇”，大有水火不容之势。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渐走上了发展商品经济的道路，与此同时，文学以及文学家的地位受到了市场经济的极大冲击，“我不是作家”“我搞的不是文学”等“顽主文学”意识大行其道，纯文学的地位一落千丈。但在文学研究尤其是学院派的文学研究中，坚守着“纯文学历史批判”^[6]的价值立场和精神向度还是其文学价值评判的主要标准。滥觞于此，作为通俗小说序列之一的“官场小说”虽然在纸媒衰竭的年代创造了销售神话，但作为一种边缘性的或者说是与“政治”再次紧密相关的文学体裁，很难进入主流研究的视野。对此，如何正确认识官场政治以及如何正确认识官场文学就成为了横亘在文学研究面前的一道鸿沟。不跨此沟，无论是《迷城》还是其他与之相似的小说作品，我们都难以认识其真正价值。

受中国传统“官本位”文化以及“五四”国民性批判的影响，一说到官场，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官场潜规则、权钱色交易、流氓性与奴隶性共生等政治生态话语。对此，无须大量引用现代政治学话语进行辩驳，只须看一下官场小说家们自身是如何认识的就可以了：

政治本来是正大之事，是人类智慧、理念、情怀的综合体现，这个场域中的竞争应该是光明正大的，却被许多人搞得龌龊不堪。而这些人是有传承的。最近的根源就是“文革”。“文革”把人的道德、伦理底线践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谓“破四旧”，把传统中美好的一面都破掉了，而把阴暗的一面完全释放出来。改革开放已过三十年，其流毒还未肃清，仍然深深地影响着现在的政治生态。愤恨、抱怨确实没什么用，只能由几代政治精英前赴后继、合力改造。^{[7]172-173}

政治是正大光明之事，是现代社会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此，“官场”并不只是黑幕、

谴责小说所构想的文学“幻境”，而是实实在在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社会现实。等而言之，官场文学亦非不登高雅之堂的末技小道，而是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的重要形式，对此，一些有识之士早已发出呼唤：“与所谓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相比较，对于我们的作家而言，恐怕更多地还是应该在政治社会题材的意义上理解看待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政治看作是社会上客观存在着的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着重要影响的一种社会事物。在某种意义上，既然说我们既可以有表现乡村生活的乡村题材小说，也可以有透视市民生活的城市题材小说，还可以有审视战争生活的战争题材小说，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存在一种专门以社会政治现象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政治小说呢？我想，在有了略萨等一大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政治介入性很强的文学创作强有力的示范作用之下，这样的问题，其实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了。对于1980年代的那种‘去政治化’的纯文学观念依然存在着很大影响力的中国文学界而言，确实已经到了应该重新理解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在此基础之上重建文学与政治之间密切关系的时候了。在某种意义上，一个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的作家所面临的难题，并不是应该不应该表现政治的问题，而是到底是否具备理解并包容表现社会政治的思想艺术能力的问题。”^[8]让我们略感欣慰的是，以王跃文、马笑泉、周梅森为代表的一系列官场小说家没有辜负评论家们的厚望，他们通过扎扎实实的创作实绩努力重建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寻找到了“具备理解并包容表现社会政治的思想艺术”的表现方式。就此而言，《迷城》可以说是同类小说中的佼佼者。此部小说不仅采用双线叙事结构，让故事情节更为扑朔迷离，而且在官场叙事的外衣之下还涵盖了亲情、友情、爱情等诸多情感话题，让原本单调的政治叙事在艺术表现手法以及表现视野方面呈现出了更为多样、更为广博的特征。

《迷城》共21章，小说采用了双线并进式结构，奇数章节描述鲁乐山的受难史，主要包括鲁乐山被害后迷城县县委的应急行为，他逝世后曲折磕绊的丧葬仪式及其职位空缺之后迷城县县委新一轮的政治洗牌等情节；偶数章节是杜华章的发迹史，主要描写了他由市委政研室副主任空降迷城

之后发展旅游事业、建设迷城卤菜品牌以及在新一轮政治洗牌之后出任常务副县长接续鲁乐山整治华夏煤矿的故事情节。双线并进，前者使用倒叙的手法追溯死亡迷因，后者使用顺叙的手法，探索死亡真相；双管齐下，逐步揭开了政治迷云，这是马笑泉在叙事手法方面的重大革新。除此之外，《迷城》在艺术表现的视野方面也有极大改进。与传统官场小说只关注权力斗争的此起彼伏不同的是，《迷城》表现官场，不仅表现了政治斗争的波诡云谲，而且还在政治斗争之外描摹了诸多人间真情，如鲁乐山与杜华章之间的士人之情，杜华章与其糟糠之妻及其妻弟之间的伦理之情，杜华章与梁静云之间的爱欲、知己之情，鲁乐山与龚致远之间的师生之情，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故事情节，很好地镶嵌在了权力斗争的不同阶段，不仅“润滑”了政治斗争的枯燥感，而且让小说在艺术表现能力方面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总体而言，小说动中取静、静中写动，极好地糅合了政治与生活，让一部表现政治斗争的小说情文并茂、枝斜横溢，具备了极高的审美表现韵味和极大的艺术表现空间。

二

《迷城》之“包容表现社会政治的思想艺术能力”不仅表现在叙事手法的创新和题材容纳的广博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思想情感的源泉方面。作者无论是描摹官场人物形象，还是刻画官场斗争情节，最终都将其叙事宗旨聚焦到了人类的“存在”之“根”——“文化”之上。就此而言，《迷城》不仅是一部“官场/人情小说”，而且还是一部开掘得极为深刻的“文化小说”。

恰如老舍所说：“一人群单位，有它的古往今来的精神与物质的生活方式，假若我们把这种方式叫做文化，则教育、伦理、宗教、礼仪与衣食住行都在其中，所蕴含至广，而且变化万端。”^[9]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早熟的文明体系，让生活于其中的中国人自然而然地感染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气息。这种气息有如空气一般，弥漫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变成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代代传承。故此，表现这种文化的魅力，刻画这种存在的价值，不仅不是刻意夸张或羞于启齿的事情，反而正是文学需要表现的“真

实”。事实也正如林语堂在《孔子的智慧》一书中所说：“儒家思想，在中国人生活中，仍然是一股活的力量，还会影响我们民族的立身处世之道。”^[10]不仅是儒家，中国文化史上任何一种形塑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文化力量，如道家、佛家，都如是。作为中国人源远流长的精神命脉，这些文化因子直至今日仍规约着生命个体的方方面面。就此而言，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描写官场，不失为一条重要且合理的途径。

马笑泉在《迷城》中成功地塑造了两个让人难以忘怀的人物形象：鲁乐山与杜华章。且不说作者在给人物命名时隐含的儒/道“隐喻”色彩，单看小说中此二人的性格差异、行事风格以及命运结局，我们就可发现，两人都是活生生地生活于中国文化之中的“在地”之民。鲁乐山，生性秉直、刚正不阿。写字喜用颜体风貌，其字厚重、耐品、中规中矩；行事直道而行，断然拒绝一切诈伪之人（康忠、阮东风等人）的贿赂与拉拢。不仅如此，他为人举止庄重、心地宽厚，为师“无言自化、不令而行”，为官“勇于任事，绝不推诿”，对待父母，非常孝顺，对待妻子，非常忠诚，无论是立言、修身，还是为家、为天下，都可谓做到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大“仁”之境。但就是这样一位济世利人、以天下苍生为念的共产党员、人民公仆却在自己的书房中被莫名其妙地杀害了，更为甚者，在其死后还被加上接受贿赂、畏罪（抑郁）自杀等污名。对此，作者显然对儒家文化“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的行为方式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疑惑与反思。与之相比，以“华章”命名的杜部长可谓是深得道家之精髓，道家的阴柔之术不仅成功地帮助他成名立业，而且还在其人生遭遇困境之时一次次地助他化险为夷。比如他在“干脆利落、气势强劲”的迷城县一把手雷凯歌手下做事，不仅没有忤逆其鳞，使其大动肝火，而且还多次以柔道之道化干戈为玉帛，事半功倍地完成了其所交待的任务。他不仅对上如此，对下亦如是。熟悉现行官场政治生态环境的杜华章，对职场中的许多不规范行为如请客喝酒、洗脚、洗桑拿等等，并不像鲁乐山一样断然拒绝，而是采取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应物观”，顺应行之，这样，不仅取得了亲民之效，而且还往往能够在办事的

过程中调动下属的积极性，以“无为”得“有为”。除此之外，道家作为传统文化中含英咀华的“政术”还在杜华章仕途遭遇挫折时多次助其渡过了人生险境。当常务副县长之位空缺，纪委书记阮东风与统战部长纪国红争得不可开交之时，杜华章采取“尸居之术”成功上位。再如，在调查煤矿跨采事件遭遇瓶颈之时，他以李泌“动静之说”相勉，最终化险为夷。总而言之，道家以其顺时应物之力一次次地让杜华章在繁复纷纭的政局中或脱颖而出或抽身而退，其不可谓不是治世之良术。但若仅止于此，我们很难说《迷城》就是一部优秀的官场小说。林语堂创作《京华烟云》《朱门》等作品时，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人物成传统文化的“符号”，从而让外界更好地了解中华文化。林语堂这样做，对文化传播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官场小说也要如此，换句话说，一部好的官场小说并不是说只要其官场人物具备了传统文化的内涵就实现了官场叙事的突破。官场有其自身文化政治属性，恰如李泌所言“方如行义，圆如用智。动如逞才，静如遂意”，官场文化不是静止的，而是时时刻刻都在风云变幻之中，这就要求承载传统文化内涵的官场人物亦不能固守成规而应以不变应万变。可喜的是，马笑泉的《迷城》表现官场叙事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但他并没有让其小说中的人物成为静止的“符号”，而是让其充分吸纳了官场叙事的“行动性”特征，处处化静为动。这主要表现在人物形象塑造与文化新变两个方面。在小说中，杜华章在早期的一系列行动中采取的都是柔韧退却之术，他以柔化刚，不仅顺势而上，而且保全了自身，但在其友人鲁乐山被谋害之后，这种一味隐忍的道家之术就不一定能够再起作用了。形势所需，杜华章在千钧一发之际领悟到了道家思想的弊端，从而化静为动，积极顺应《易经》“刚应而志性，顺以动，豫”的卦象，最后不仅避免了杀身之祸，而且在新一轮的政局洗牌中脱颖而出，成就了真正的“大丈夫”之道。再者，马笑泉描写官场叙事中的文化氛围，并没有被动地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是对之进行了新变式的描写。此诚如他在党校中的所授之课，他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的道理来阐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以“居其实，不居其华”来阐释“代

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以无事取天下”“为而不争”来论述干部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让企业按经济法则运行,以达到“事少而功多”的效果^{[7]38}。就新时代的政治而言,如若拘泥于传统文化的语境,我们很难适应新的时代语境。马笑泉的《迷城》使用文学与文化相结合的手法进行官场小说叙事,不仅揭秘了传统文化根底在中国政治体制运行中的秘密,还揭示了新时代下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遇合与新变。这样,其官场叙事的价值内涵和意义指向才不至于虚妄。

综上,《迷城》不仅突破了林语堂式的推介中国文化的“载道式”小说模式,而且突破了官场小说揭秘官场权术、游戏规则、圈子意识的“官场教科书”式的功利化书写方式,真正实现了文学创作与文化浸染的结合,让官场小说的叙事的形式以及思想艺术能力的表现都得到了极大的创新,这不得不说是官场小说叙事走向纵深的一次重要尝试。

三

除了纵深叙事以外,《迷城》作为一部官场小说,它在表现文学主题的横截面方面也有着重大的创新,对此,我们不妨先试看《迷城》小说的开头与结尾: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九日清晨,在入云桥那家有百年历史的老粉店品过早粉后,杜华章照例不走主街,而是潜入粉店侧对面的小巷中。这条小巷像一根用颤笔写出的线条,抖抖地延伸着,时而甩出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弧度,时而又逸斜出另一根线条。无论是沿着它走到底,还是拐进中途连接它的另一条小巷,都会面临更多的转折和分叉。初到此地时,杜华章曾多次迷失在这些曲折连绵的小巷里。如今三年时光快过去了,虽然能大致理清它们的脉络,但藏身于小巷中那些数不清的槽门和院落,对他而言,仍然有未能穷尽的神秘意味。^{[7]1}

在小韩和小龙的陪伴下,杜华章再一次潜入那似乎无穷无尽的小巷。世人大多已沉睡,只有零星的灯火凝结于广大的幽暗中。杜华章聆听着不紧不慢的脚步声,越走下去越感到沉静。他深深地迷恋这种氛围,他早已清楚自己迷恋的其实是一种传统,一种文化,但他现在明白,这种传

统文化有非常可爱可敬的地方,也有异常暧昧含混甚至是可厌可憎的部分。如何厘清,如何切割,是一件需要深入思考和慎重推进的大事,也绝非自己一人之力所能完成。但杜华章觉得自己并不孤单,他想起了鲁乐山,想起了龚致远,想起了梁秋夫和圆镜法师,最后想起了何标。^{[7]388}

如若说初读开头我们能体会到的是其官场之路的形象隐喻的话,那么当我们读到结尾之时,我们不禁为这篇小说大开大阖的气势、丰厚深重的内涵而惊诧。这一条条谜一样的小巷与其说是官场权术的隐喻,不如说是人生之路的表征。“官场”作为人类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它何尝不是“人生”的隐喻呢?

“人生是谜”——这不仅是生命个体而且是所有人类文化集体迷失的“文学母题”。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虽已窥得“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的宇宙秘术,但仍不免走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绝境之路;再如老庄道家,虽极力主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复观。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但其思想内涵中仍不时显露出政治的诡诈之术,也难脱“夫饮酒猖狂,或沉寂无闻,亦不过是洁身自好耳”的窠臼;甚至于西方文化,无论是出生即带“罪感”、终身都在寻找“归乡”之旅的基督教文化,还是日日祷告、急切想要回到真主怀抱的伊斯兰文化,人类文化无一不是“人生是谜”的典型表征。对此,《迷城》作为一部官场小说,不隐晦、不遮蔽,努力寻找人生之谜的解答,试图用文学形式解密存在之维。

官场小说伴随情爱叙事或者说重点描写性叙事似乎已经成为了“官场”叙事的惯例。《迷城》在描写官场斗争之时,也有一条副线,即杜华章与梁秋夫之女梁静云的婚外恋情。对此,作为文本的正面人物,作者并没有让杜华章成为禁欲系的官方代表,而是真实地表现了他先前在市里工作时的短暂出轨以及到了迷城之后的“精神恋爱”。情欲,作为人生最大的、最不可捉摸的谜题,即便聪明、睿智、通透如杜华章,亦难以逃脱这张迷之大网。更为难得的是,随着小说叙事情节的发展,情欲之线的迷离与错综也更为生动地表现了迷局之中人物的复杂心态:如杜华章虽爱慕梁静云,但在具体日常生活中他仍能时时体会到糟

糠之妻的可贵之处；同样，深受情伤的梁静云虽也深爱着杜华章，但她考虑到小孩的问题，考虑到杜华章的事业问题，最终还是克制了情欲的冲动，选择成为杜的“红颜知己”。对此，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去指责杜华章的“不忠”，也没有理由去苛求梁静云的“贞节”，更没有理由去指责杜妻的“捕风捉影”，而只能说，身在其中，究竟是何种况味，只有这些人物自己才清楚。这难道不正是人生谜题的真正况味之所在吗？

再者，作为一部官场小说，《迷城》最主要的线索围绕着寻找鲁乐山死亡之谜展开，但只需通读全文，我们即可发现，《迷城》突破了已有官场小说“善恶到头终有报”的二元对立模式，对小说结尾进行了“模糊化”处理：

据凌副队长事后告诉杜华章，有一部分证据似乎被人为销毁了，而且并非张红革所为。剩下的某些证据隐隐指向鲁乐山的死亡。但所有涉案人员都仿佛接到了统一的封口令，坚决不承认与此事有关。其结果是他们都活了下来，连阮东风也只判了死缓，需要付出死亡代价的只有前猎人。^{[7]386}

这不是作者为了激起读者义愤而特意为之的“迷”之结局，也不是为了赚取噱头而故意设置的悬疑搁置，而是生活本来就是一道谜题！至于如何解决这道谜题，小说并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而只是提供了一些文化之“思”的启示：一是儒家君子，当仁不让，勇往直前，不断地去解决问题，以此建功立业，这当然很可贵，处理日常事务主要靠这种担当；但是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出现，很多时候还是重复出现，最终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二是道家的政治家化繁为简，只在关键时刻出手，小问题就顺其自然，这样既能建功立业，又相对超脱，最后还要来个功成身退，像张良、李泌，都是这种处事方式；但总体说来，道家偏于阴柔，甚至有些诡诈，很容易由阴柔蜕

变为阴谋。三是佛家解决根本问题，个人修行上怎么做，经书上讲得很明白；但佛家思想具体如何运用到施政上，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

综览《迷城》，小说不仅在叙事手法、艺术表现、文化根底等各个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创新，而且还在政治斗争与日常生活的人间格局之上探索了关于宇宙人生的谜题，这不得不说是《迷城》在叙事格局、文化隐喻方面的重大突破。就此而言，《迷城》堪称当代官场小说的杰出代表，其对中国官场小说叙事模式所做的突破有目共睹，也可以说其为后续官场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书写范式，值得学界的关注与重视。

参考文献：

-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91.
- [2] 武新军.新官场小说求疵[J].当代文坛，2003(5)：55-56.
- [3] 张存凯.20世纪90年代官场小说三题[J].晋中学院学报，2005(4)：4.
- [4] 鲁迅.文艺与革命[M]//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85.
- [5] 鲁迅.中国文与中国人[M]//鲁迅.鲁迅全集：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83.
- [6] 毕光明，姜岚.纯文学的历史批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1.
- [7] 马笑泉.迷城[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
- [8] 王春林.一部拥有鲜明文化品格的政治小说：关于马笑泉长篇小说《迷城》[J].长江文艺评论，2018(1)：107-108.
- [9] 曾广灿，吴怀斌.老舍研究资料[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588.
- [10] 林语堂.孔子的智慧[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3-4.

责任编辑：黄声波